

李建军 (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, 成都 610065 )

# 敦煌写本《春秋谷梁传集解》的文献价值

[ 关键词 ] 校订舛误; 保存异文; 古本; 精本

[ 摘 要 ] 敦煌卷子伯二五三六号乃是《春秋谷梁传集解》卷三的写本。用这个写本来比勘中华书局影印本和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, 我们可以校订出不少今本的舛误之处。同时, 这个写本保存了大量有别于今本的异文, 有些是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也未著录的, 弥足珍贵。另外, 这个写本不仅是依《汉志》十一卷之旧式的古本, 也是品相完好、书法精工、字迹清晰的精本, 可以作为唐代经籍写本的一个样板来进行研究。总之, 该写本在校勘、版本等方面的文献价值不可低估。

[ 中图分类号 ] G256

[ 文献标识码 ] E

[ 文章编号 ] 1005- 8214( 2006) 06- 0059- 02

敦煌卷子伯二五三六号乃是《春秋谷梁传集解》( 以下称《集解》) 卷三的写本, 该写本由庄公十九年( 前677年) “滕浅事也”起, 至闵公二年《集解》末止, 凡二百七十六行。《春秋经》和《谷梁传》用大字书写, 每行字数由十三字至十六字不等, 范宁《集解》用夹行小字附于经传之下。写本末题“龙朔三年三月十九日书吏高义写”, 龙朔为唐高宗年号( 公元661- 664年), 高义其人于史无征。但该写本不但“民”“治”二字均缺末笔( 避唐太宗李世民、唐高宗李治讳), 而且凡“庆”字也缺末笔, 故罗振玉据此推测: “考唐代诸帝无名‘庆’者, 此或是嗣道王府吏为嗣道王所书, 故避道王元庆讳与?”<sup>[1] 58</sup> 该卷子书法精工, 判定其为官府写本当为不差。该写本应该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《集解》的最早本子, 但问世以来, 关注者寡, 除了罗振玉(《雪堂校刊群书叙录》)、刘师培(《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》)、王重民(《敦煌古籍叙录》)等曾着眼于此写本外, 罕有学人留心于这份卷子。殊为遗憾的是,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《春秋谷梁传注疏》在全面吸纳前人成果、详细比勘各种版本的时候, 竟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敦煌写本的校勘价值, 实在令人感慨! 看来, 我们是有必要把这个写本的价值揭橥出来的。

## 1 校订今本之舛误

阮元对自己主持刊定的《十三经注疏》作了细致的校

勘, 孙诒让在阮元的基础上又纠偏救弊, 北大标点本又在阮、孙的基础上再行拾遗补阙, 应该说今本《春秋谷梁传注疏》(即北大标点本, 下同, 不再出注)还是比较完善的, 但我们用敦煌写本来比勘, 还是可以发现今本仍有不少舛误之处。

(1) 庄公二十有二年, 陈人杀其公子禦寇。言公子而不言大夫, 公子未命为大夫也。其曰公子, 何也? 公子之重视大夫, 视此。命以执公子。大夫既命, 得执公子之礼。<sup>[2] 85</sup>

按: “ ”前的为《春秋经》文, “ ”后的为《谷梁传》文, 小号字为范宁《集解》。敦煌写本“公子之重视大夫”下范注为“视, 比也”, <sup>[3] 599</sup> 而今本作“视此”。显而易见, 今本作“视此”于上下文义扞格难通。依据写本, 我们可判定今本“视此”中的“此”当为“比”之形近致误。

(2) 庄公二十有二年, 秋, 七月, 丙申, 及齐高傒盟于防。不言公, 高傒伉也。书曰, 则公盟也。高傒骄伉, 与公敌体, 耻之, 故不书公。<sup>[2] 86</sup>

按: 范注中“高傒骄伉, 与公敌体”写本“体”作“礼”, <sup>[3] 599</sup> 根据文义, 当以写本为是, 今本中的“体”(体)当是“礼”(礼)的形近致误。

(3) 庄公二十有三年, 公至自齐。公如, 陈公行例。往时, 正也。正谓无危惧也, 皆放此。<sup>[2] 87</sup>

按: 范注中“正谓无危惧也, 皆放此”写本作“正谓无危惧也, 他皆放此”, <sup>[3] 599</sup> 写本多一个“他”字。遍检《集解》, 别处也有“他皆放此”的说法, 却独独没有“皆放此”的表述。根据写本和今本自身的内证, 我们可判定今本脱“他”字。

(4) 庄公二十有四年, 八月, 丁丑, 夫人姜氏入。入者, 内弗受也。日入, 恶入者也。何用不受也? 以宗庙弗受也。<sup>[2] 88</sup>

按: 传文中“何用不受也?”写本“不”作“弗”, <sup>[3] 599</sup> 因为下文就提到“以宗庙弗受也”, 我们可以判定写本作“弗”比今本作“不”更优。

(5) 庄公三十有二年, 秋, 七月, 癸巳, 公子牙卒。……郑君释之曰……宁案……然则不称弟, 自其常例耳。郑君之说, 某所未详。<sup>[2] 100</sup>

按: 范注中“郑君之说, 某所未详”之中的“某”在中华书局影印本中作“其”, 阮元在《校勘记》中说“闽、监、毛本‘其’作‘某’, 是也”, <sup>[4] 230</sup> 故今本(北

大标点本)据阮校改“其”为“某”。实际上,不管是影印本作“其所未详”还是标点本作“某所未详”都欠妥,《集解》中别处再无“其所未详”或“某所未详”的说法,孤例是很难自圆其说的。“其所未详”和“某所未详”都欠妥,那么此处应作什么呢?写本作“宁所未详也”,<sup>[3]594</sup>甚当。根据行文,前边说“宁案”,末尾作结论批评“郑君之说”“宁所未详”,前后俱是范宁自称,这才文气贯通。又,《集解》中有多处“宁所未详”的说法,有一处作“郑君之说,似依《左氏》,宁所未详”,<sup>[2]291</sup>更与此处丝丝入扣。据此,我们可以断定影印本和今本此处俱误,还是当依写本作“宁所未详”为妥。

(6) 闵公二年,公子庆父出奔莒。其曰出,绝之也。庆父不复见矣。庆父弑子般、闵公不书弑,讳之。<sup>[2]104</sup>

按:范注“庆父弑子般、闵公不书弑,讳之”写本作“庆父弑子般、闵公,不复见矣,讳也”,<sup>[3]595</sup>虽然今本和写本的提法都说得通,但范宁此处是为传文“庆父不复见矣”作注,故写本作“不复见矣”比今本作“不书弑”更为贴合。

(7) 庄公二十有四年,赤归于曹。郭公。赤盖郭公也,何为名也?礼:诸侯无外归之义,外归,非正也。……君为社稷之主,承宗庙之重,不能安之,而外归他国,故但书名,以罪而惩之。……以郭公著上者,则是诸侯失国之例,是无以见微之义。<sup>[2]90-91</sup>

按:范注“是无以见微之义”写本作“是无以见惩之义也”。<sup>[3]599</sup>根据行文,前边言“以罪而惩之”,后边之言应与之呼应,故写本作“惩之”比今本作“微”更佳。

从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,我们可以看到,用敦煌写本来比勘今本,今本确有脱、讹等舛误之处,所以这个敦煌写本是有重要的校勘价值的。

## 2 保存别本之异文

这个敦煌写本不仅因其可校订今本之舛误而弥足珍贵,也因其保存了大量有别于今本的异文而颇有价值。这些异文,有些是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(下简称《释文》)已经著录的,有些是该书未著录的。我们先来看前者:

(1) 庄公十九年传文“不以难迎我国也”,《释文》:“迎,如字,本又作介。”<sup>[2]83</sup>写本“迎”就作“介”。<sup>[3]588</sup>

(2) 庄公二十三年经文“冬,十有一月,曹伯射姑卒”,《释文》:“射音亦,本或作亦。”<sup>[2]P88</sup>写本“射”就作“亦”。<sup>[3]589</sup>

(3) 庄公二十四年注文“取断断自脩整”,《释文》:“脩飭,本或作勒,一本作饰,或作整。”<sup>[2]90</sup>写本“整”就作勒。<sup>[3]590</sup>

(4) 庄公二十七年注文“僖元年会桎”,《释文》:“杙,本亦作桎。”<sup>[2]93-94</sup>写本“桎”就作“杙”。<sup>[2]591</sup>

(5) 庄公二十七年注文“越竟逆女,纪罪之”,《释文》:“越竟,本或作疆。”<sup>[2]95</sup>写本“竟”就作“疆”。<sup>[3]591</sup>

(6) 闵公元年经文“秋,八月,公及齐侯盟于洛姑”,《释文》:“洛姑,一本作路姑。”<sup>[2]102</sup>写本“洛姑”就作“路姑”。<sup>[3]594</sup>

从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,我们可以发现,写本与今本不但在注文上,甚至在传文和经文上都有差异,也许《集解》在陆德明之前就已经有数个传本,而敦煌写本与今本则可能属于不同的传本。换言之,相对于今本,敦煌写本

乃是别本。也正因为此,敦煌写本的异文也就颇有价值了,而且有些异文是《释文》也未著录的,这就更加珍贵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那些《释文》也未著录的异文:

(1) 庄公二十有二年,癸丑,葬我小君文姜。小君,非君也。不治其民。<sup>[2]85</sup>

按:范注中“不治其民”写本作“不治民也”。<sup>[3]588</sup>

(2) 庄公二十有四年,秋,公至自齐。迎者,行见诸,舍见诸。诸,之也。言瞻望夫人乘车。<sup>[2]89</sup>

按:范注中“瞻望”写本作“瞻见”。<sup>[3]590</sup>

(3) 庄公二十有九年,春,新延廐。……古之君人者,必时视民之所勤。<sup>[2]97</sup>

按:传文中“君人者”写本作“君民者”。<sup>[3]592</sup>

(4) 庄公三十有一年,筑台于薛。薛,鲁地。<sup>[2]99</sup>

按:范注中“薛,鲁地”写本作“薛,鲁邑也”。<sup>[3]593</sup>

(5) 庄公三十有一年,秋,筑台于秦。秦,鲁地。<sup>[2]99</sup>

按:范注中“秦,鲁地”写本作“秦,鲁邑也”。<sup>[3]593</sup>

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,写本与今本存有差异,很难判定谁是谁非,那么在校勘时就应该把这些异文胪列出来,以广见闻,以资学人。可惜的是,北大标点本忽略了这个写本,也就错过了这个广泛胪列异文、以资学人的机会。

## 3 展现古本、精本之风貌

六朝以来,《春秋谷梁传集解》流行的本子是十二卷本,每公一卷,而这个写本却把庄公、闵公合为一卷,与流行本很有些不同。实际上,这个写本的分卷与唐石经庄公标卷三、僖公标卷四相合,而且这种分卷也正合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《春秋谷梁传》十一卷的旧式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这个写本是早于十二卷流行本的一个古本。敦煌卷子的问世,使我们可以一睹古本的风貌了。

这份敦煌卷子品相完好、书法精工、字迹清晰,可以说它又是一个精本,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唐代经籍写本的一个样板来进行研究。细观此本,我们发现它在文字运用上是有特点的。其一是常用俗字,比如把“葬”写作“塋”,把“與”写作“与”。写本使用俗字的原因是俗字比原字更简单,这反映出写本在用字上趋简的取向。也正是为了趋简,这个写本把“二十”都写作“廿”,把“三十”都写作“卅”。这个写本在文字运用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多用今字。我们知道,有些古字到了六朝隋唐,它的某些派生意义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加上表意偏旁的新字来表示了,这样就产生了给“古字”加上表意偏旁而演变成的“今字”。这个写本就多用今字。比如在表示避让之意的時候,写本径直将古字“辟”改为今字“避”;又如在表示边境、国境之意的時候,将古字“竟”改为今字“境”;又如在表示齋戒、齋洁之意的時候,将古字“齐”改为今字“齋”;再如在表示逊让之意的時候,将古字“孙”改为今字“逊”。今天的整理本,为了保持古籍的原貌,尽量用与古籍时代相合的古字,而不用后人改换过的今字,这是对的。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那些使用“今字”的文献的价值,因为正是这些文献,给我们提供了追寻文字演变踪迹的线索。这个写本在文字运用上的第三个特点是爱用语助。这份卷子特别爱用语气词“也”,尤其是范宁的注几乎每句结束都是用“也”字煞尾。另外,这份卷子也爱用语气词“耳”“矣”。与今本相比勘,我们发现,这个写本语气词使用的频率太高了,这也许是今本

张梅秀 ( 山西大学 图书馆, 太原 030006 )

## 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补正四题

[ 关键词 ] 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; 补正;  
《李襄敏公奏议》; 《万历疏抄》; 《淮鹺本论》; 《山西赋役全书》

[ 摘 要 ] 依据馆藏 4 种古籍善本, 从版本、卷数等方面对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进行补正。

[ 中图分类号 ] G255.1

[ 文献标识码 ] E

[ 文章编号 ] 1005- 8214 (2006) 06- 0061- 02

为配合山西省文物古迹调查, 近来对馆藏善本古籍逐一进行核对, 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作为手头必备的工具书常置案头, 查检时不时发现有与原刻本不符及失收的情况, 此就所见聊为补缀, 或有益于读者。

### 《李襄敏公奏议》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: 李襄敏公奏议十三卷遗思录五卷, 明李遂撰; 明李君栻、李君材辑, 明万历刻本。完本为山西大学图书馆独家收藏, 湖南省图书馆藏明刻十四卷本, 残存三至十四卷。

李遂, 字邦良, 号克斋, 人称罗山先生, 明江西丰城人。生于明弘治十七年 ( 1504 年 ), 卒于明嘉靖四十五 ( 1566 年 ) 年。嘉靖五年 ( 1526 年 ) 进士, 历官右金都御史、督抚、兵部尚书等, 卒谥襄敏。明史有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存目收有他所著《督抚经略疏》八卷, 云: “是编乃其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凤阳四府时所上奏疏, 起嘉靖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迁秩还京, 因哀辑成帙。”书为浙江巡抚采进, 确切刻年未注明。该书除在乾隆钦定《续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中有著录外, 各家书目鲜见记载。《四库存目丛书》编纂时, 因《督抚经略疏》不见流传, 而以本馆藏《李襄敏公奏议》本代之, 删去遗思录, 收入前三卷, 著录为明万历二年 ( 1574 年 ) 陈瑞刻本。

馆藏本奏议十三卷首一卷遗思录五卷, 半页九行, 行

十八字, 白口, 左右双边。书前有明隆庆三年 ( 1569 年 ) 徐南金《李襄敏公奏议序》, 茅坤《督抚经略序》, 明万历二年 ( 1574 年 ) 孙应鳌、陈瑞《李襄敏公奏议序》。

奏议部分板框高 18.6cm, 宽 14.8cm。十三卷内容以时间编排, 前有总目录。卷一、二为祠部稿; 卷三为操江稿, 目录后题“以上奏疏自嘉靖十二年起至三十九年止”; 卷四至卷十一为督抚稿, 目录后题“以上奏疏自嘉靖三十六年冬起至三十八年冬止”; 卷十二、十三为本兵稿。全书共收奏疏 96 篇。徐南金序云: “南京兵部尚书克斋李公既歿之明年, 伯子进士君栻仲子君材辑其平生所为奏疏, 盖祠郎暨督抚以至大司马, 厥所敷陈建树咸备, 乃汇次为若干卷刻之, 君子观之, 莫不为之咨叹逊伏, 肃然起敬焉。”李遂卒于嘉靖四十五年 ( 1566 年 ), 次年即明隆庆元年 ( 1567 年 ), 可证奏议部分为隆庆元年所刻。

遗思录部分与奏议部分相比, 板框要稍大些, 高 20.3cm, 宽 14.6cm。字体亦略大, 证明不是同时所刻。遗思录前有嘉靖四十三年 ( 1564 年 ) 九月二十日和嘉靖三十八年 ( 1559 年 ) 十二月二十七日、隆庆元年 ( 1567 年 ) 五月七日、万历元年 ( 1573 年 ) 四月二十日制诰, 像赞。分序记、诗歌、祭文、碑铭、书简五卷。陈瑞在序中说: “文正公生平笺疏得二子以永其传, 故颂文正之忠者称二子之孝不衰。然则是编之成世济美, 固公之所以为忠而实伯仲之所以为孝也, 宜其流布宇内与国史共不朽矣。瑞不佞, 于门墙无能为役, 既饷诸梓, 复追叙畴昔之感, 端拜而谨书之。”从陈瑞序中可以看出, 他并没有参与刻书之事。且万历二年 ( 1574 年 ) 距隆庆元年 ( 1567 年 ) 不过 7 年时间, 其时李君栻、李君材正到处请人为其父作行状和碑铭, 前所刻奏议部分书板当仍保存完好, 不可能重新镌刻。应该是万历二年 ( 1574 年 ) 把收集起来父亲的书信及别人写的祭文、碑铭等刊刻, 与前所刻奏议一同刷印成册行世。

所以, 是书的正确刊刻年代应是明隆庆元年 ( 1567

经过反复整理, 而写本接近原貌的缘故吧。实际上, 管中窥豹, 可见一斑, 这个写本在文字运用上的上述特点 ( 常用俗字、多用今字、爱用语助 ), 也许正折射出了唐代经籍写本的共性呢! 从这个意义上讲, 这份敦煌卷子又怎能不弥足珍贵呢?

### [ 参考文献 ]

- [ 1 ] 王重民. 敦煌古籍叙录 [ M 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58.
- [ 2 ] 李学勤. 春秋谷梁传注疏 [ Z ] // 十三经注疏. 标点

本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9.

- [ 3 ] 黄永武. 敦煌宝藏 [ M ]. 台北: 新文丰出版公司, 1986.
- [ 4 ] 春秋谷梁传注疏 [ Z ] // 十三经注疏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

[ 作者简介 ] 李建军 ( 1974- ), 四川省大竹县人,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。

[ 收稿日期 ] 2005- 10- 08 [ 责任编辑 ] 张京生